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 编

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

HUIYIGUIZHOUGAIGEKAIFANGSANSHINIAN

贵州文史资料专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史资料专辑
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

(上册)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玉环	苗春亭	王朝文	龙志毅
	王思齐	梁明德		
主 任	黄 瑶			
副 主 任	吴嘉甫			
委 员	刘鸿庥	陈海峰	杨玉学	孔令中
	左定超	武鸿麟	谢晓尧	刘也强
	马文骏	许乐仁	伍席源	李金顺
	何永康	李 平	李嘉琥	王录生
	相小青	唐世礼	夏一庆	洪宗良
	刘学洙	陈 石	陈凌华	唐方信
	韦 林	粟多能	杨启义	张定书
	杨继红	邓应明	干正书	王礼全
	许 明	刘援朝	肖向阳	刘 晓
	胡 巍	李跃荣	尹晓芬	金道超
	黄惠玲	宋新民	赵友良	朱开茗
	郭 勇	梁桂宝	张国新	潘 健
	姚钟伍	陈海若		
执行编委	吴嘉甫	刘也强	伍席源	李金顺
	何永康	王录生	干正书	王礼全
主 编	伍席源	李金顺		
副 主 编	干正书	王礼全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王明富			
办公室工作人员	刘 丽	徐项宏		

前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生前大力倡导的。它主要是广泛征集近、现代历史资料，经研究整理后，编辑出版；其特点是征集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及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

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由黄瑶同志提议，经省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编辑贵州文史资料专辑《回忆贵州改革开放 30 年》。为此，省政协组建了编辑委员会，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按照“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围绕贵州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的重要决策、重要工作部署、重要活动及全省的巨大成就和变化，撰写回忆文章，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我省 30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宣传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和各族人民所经历的艰辛探索、取得的伟大成就。

编辑本专辑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在《关于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黔党发〔2008〕7 号）中，把省政协的这项工作列为全省纪念活动的第二项；省委负责同志多次关心、过问编辑进展情况。省政府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和各方面的支持。这些都保证了本专辑得以顺利结集出版。

编辑工作得到了市、州、地、县各级政协、有关部门和单位、离退休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各级政协进行了及时有效的组织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提供资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离退休老同志和其他各方面的人士踊跃投稿，在开始征稿后的 100 天时间内即送来了 400 多篇稿件。

按照“三重”(重要决策、重要工作部署、重要活动)和“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编者遴选了148篇编入专辑,对未能入选的文章区别情况分别进行了妥善处理。

由于一些篇目回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贵州工作的情况,根据有关规定,2008年11月下旬、12月下旬,编辑部两次赴北京送审稿件。中央办公厅非常重视和关心,对有关稿件进行了审阅修改,并于2009年2月同意对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情况的5篇文章按审定稿在省内新闻媒体公开发表。这5篇文章是:《探索乌蒙发展路》、《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后的几点回忆》、《安顺市改革试验区回眸》、《安顺市改革试验区建立前后》和《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始末》。

专辑篇目顺序以时间顺序为主,在同一时间段内内容、性质相近的文章相对集中编排在一起;以专题为辅,按专题相对集中。以时间顺序为主,是为了方便读者系统了解贵州改革开放推进的脉络;按专题相对集中,则便于读者集中了解某个方面情况。

文章作者职务置于文章末尾,用括号加注。已离退休的,只注明文章所述往事时的时任职务;在职的,注明现任职务,如需要,同时注明时任职务;文章所述内容时间跨度较长的,注明作者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协助作者整理文章者,不在书中注明。

省政协办公厅为保证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贵州人民出版社提前介入编辑工作,为专辑的出版打下了良好基础。《贵州政协报》密切配合编辑工作,选登了一些未收入专辑的来稿。编委会办公室的同志们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此,向所有赐稿的同志,向为编辑出版工作提供帮助的单位和同志,向所有关注本专辑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努力再现贵州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但想全实难全;我们希望为读者提供一本高质量的精品读物,然求精不易精。由于编者水平、时间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2月

目 录

(上册)

- 省委是怎样下决心允许包干到户的 王朝文(001)
- 我给中央写信建议取消“不准包产到户”的禁令 钱云洲(011)
- 农村改革的先声
- 记顶云公社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 ... 刘学洙(015)
- “包干到户”：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
- 贵州省委 1980 年《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
- 出台前的几件事 李 菁(022)
- 贵州率先启动农村改革亲历记忆 陈谨之(033)
- 从“一土两制”到全面包产到户
- 正安县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历程
- 李道德(037)
- 包干到户后迈出的两大步
- 乌当区扶持重点户、专业户和发展乡镇企业历程
- 李世荣(041)
- 从剥夺农民的高征购到惠及民生的粮食改革 王民三(045)
- 谋划贵州的全面改革和长远发展
- 回忆在贵州省委的工作 朱厚泽(052)



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始末	高春生(065)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	
——我所亲历的贵州改革开放 30 年	何仁仲(070)
徐健生——贵州旅游铺路人	刘秀鸾(082)
对贵阳市改革影响最大的五次会议	李万禄(092)
社会办公交 化解城市乘车难	陈文辉(104)
云岩区在全国首创街道财政	王国蓉(108)
贵阳的“菜篮子”工程 ... 陈贵蜀 吴太君 张长荣 蓝奕广	(114)
六盘水市引进人才“三不要”	谢养惠(121)
上世纪 80~90 年代我省工业交通的改革与发展	刘玉林(124)
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贡献	程天赋 罗朝启(130)
难忘的审计岁月	马三民(136)

探索乌蒙发展路

——1985 年胡锦涛同志对毕节地区的首次考察 ... 刘学洙(144)

向贫困山区的大进军

——省委从 1986 年开始派工作队进行大规模扶贫

..... 龙志毅(155)

六任省长与丹寨

曾祥伍 吴仁发(160)

放开 搞活 富民

——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遵义地委的一些重要决策

..... 梁明德(170)

十年工夫不寻常

——遵义地区切实抓好“五突破”、实现粮食生产发展亲历记

..... 杨春时(179)

稳征 减购 压销

——遵义地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回忆

吴宗淮(186)

我所知道的遵义地区非耕地资源开发	刘文献(191)
设计·操作·成果·效应	
——湄潭县土地制度建设试验区的建立	李 菁(198)
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后的几点回忆	禄文斌(211)
钱伟长 1997 年的毕节之行	吴愿学(220)
情系毕节试验区 20 年	常近时(226)
一个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记金沙县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	高中华(230)
联合国“3356 项目”在纳雍	郭尊荣(237)
安顺市改革试验区回眸	王向规(243)
安顺市改革试验区建立前后	严道渊(253)
科学发展观在贵州的体现	
——智力支边工作 20 多年的历程	王思明(259)
改革自有回天力	
——锦屏县林业改革 30 年	单洪根(265)
三百“娘子军”下番禺	李国士(276)
“川军”入黔与“黔军”出山	王民三(282)
罗甸早菜出大山	何荫懋 陈邦禄 陈国祥(286)
惠民政策好 农村气象新	
——忆从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	梁旺贵(294)
我在民族村寨带头种杂稻	李光厚(297)
贵阳市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性转变	赵宗哲(301)
盘江煤电并举决策的前前后后	宋福林(311)
在黎阳工作的日子	王新民(318)
开磷集团磷的深加工基地建设纪实	屈庆麟 彭思君(322)



浇铸中国现代铝工业的基石

- 贵铝 8 万吨电解铝引进工程始末 常顺清(328)
-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神奇集团 张芝庭(336)
- 贵州首家中外合资企业落户黔东南 沈光昶(345)
- 出山下海闯深圳 杨 柏(350)

千军万马大搞“坡改梯” 刘正威(359)

上世纪 90 年代农业农村工作回顾 袁荣贵(364)

“石漠化”从书斋走向社会

- 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一次重要建言献策 ... 王录生(373)
- 劈石造田的罗甸大关村 韦应章(377)
- 石山上的经济林 郑各明(382)
- 贵阳市中华路改造建设的前前后后 刘也强(388)
- 剑江河治理二三事 梁登峰(397)
- 上世纪 90 年代的凯里市政建设 邓锦洲(402)
- 小城镇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秦葆荪 李成文(411)
- 虾子镇辣椒市场建设 梁 忠(418)
- 立足中小企业 服务广大市民

——贵阳市商业银行在坚持改革中发展

..... 彭士学 黄婷婷(421)

南方谈话后的贵州改革开放 龙志毅 许 明(427)

难忘的麻山调查 蒙素芬(437)

财政工作要从源头抓起

——一项对贵州发展影响深远的决策 ... 顾庆金 向阳生(443)

我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黔中天、黔凯涤	徐 铁(452)
茅台股票上市	季克良(461)
回忆在镇宁红蝶铝业公司的调查	王广宪(467)
东西部合作的成功典范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落户镇宁纪实	
..... 张世德	韦 林(471)
贵州轮胎厂股份制改造历程	马世春(477)
水钢改革发展中的特殊工程	王黎明(486)
浴火重生	
——六枝矿务局破产重组的十年变迁	施文刚(493)
在改革中发展 在发展中改革	
——贵州邮电改革 30 年回顾	王国昌(499)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发展之路	陈清洁(507)
实施“阵地前移” 推进军民结合	周万成(514)
从“抢抓机遇”到“一步登天”	
——南昆光缆路由方案决策始末	吴柳年(520)
山海一线牵	
——贵阳至香港直航旅游包机通航记	杨胜明(528)
黔鹰展翅	
——贵州航空有限公司改革纪实	段延辰(534)
龙洞堡机场建设	冯金禄 柳常富 曹正云 李 澄(546)
合资建设水柏铁路	杨谨华(553)
南昆铁路建设往事	王胜业(565)
一封关于渝怀铁路过境铜仁的建议信	赵幼立(570)
贵州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王桂生(574)
已有广厦千万间	卢云儒(582)

省委是怎样下决心允许包干到户的

王朝文

老百姓的“11号文件”和省委的“三不许”规定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被老百姓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

1979年12月,省委作出决定,强调: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搞包产到户。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全省农业合作化以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悄悄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可以避免“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生产积极性低的现象。

1978年3月,关岭县顶云公社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16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增产效果比较明显。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的做法,并在编者按中

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广大农民把这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全省各地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随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发展很快。从1979年秋收开始，到1980年春耕大忙前，贵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实际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两个农业文件，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我理解有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反复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第二点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好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

1979年4月，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农业领导小组，协助省委抓好农业工作。当时我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兼科委主任，负责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和民族方面的工作。1979年5月以后，我被调整到农业战线搞农业工作。常委里头搞农业的还有张玉环，老同志有吴肃、张军直。那时人比较多，也比较强。1980年1月4日，中央批准我为贵州省委书记；同月，省革委改为省人民政府，我当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1979年10月14日池必卿同志任代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6月23日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苏钢同志是省委书记兼省长。

对于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起初省委的意见是要纠正。1979年12月，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重申“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1980

年1月,省委转发《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再一次强调“三不许”的规定,并要求“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春耕大忙前,把容易纠正的先纠正过来,恢复集体生产”,其余的也要“确定纠正的步骤和方法”。

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全省各地立即派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行为强行纠偏,打算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现象,及时扭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这种强行纠偏的做法,遭到了广大农民本能的抵制,有的地区向省里“告急”,省里也很被动,形成了“顶牛”的严峻局面。

21 天的遵义农村调查

一位县委书记说:“按省里‘三不许’的规定办,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要是搞包产到户,又怕犯错误。”

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我是知道的,省委下发的纠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文件,我也是同意了。但是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势头很猛,农民群众要搞,又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样搞才好。

正在这个时候,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副秘书长钱云洲联名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也抄了一份给我。信里说:“我们山里东一家西一家,居住分散,有的已包产到户。看来(这种情况)死活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希望中央支持我们,不要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封信春节前送到我手里,省里正在要求纠偏,我感到压力很大。以前碰到这类问题,不是支持就是反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我不是书记也就算了,但我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不表态也不行,很作难。

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春节过后,我向池必卿同志请假,要求去遵义地区作调查研究,没说调查什么内容。正月初五(2月20日),我邀了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一行三人坐了一辆“伏尔加”车去遵义。遵义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贵州是比较好的,但同样有起伏,去这里调查很有代表性。

当时的遵义地委书记是李明,刚从黔西南州调去不久。考虑到他们刚过年,我们又想直接了解遵义农村的真实情况,就没有请遵义地委的同志一起参加调查。我们第一站到湄潭,我把铜仁那封信的意思跟县委讲了一下。县委书记杨春时说:要按省里“三不许”的意见办,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要是搞包产到户,又怕犯错误。我们当县委书记、县长的也很苦恼。我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调查研究这个事,调查以后再看到底怎么搞。

在湄潭县兴隆公社调查时,公社书记承认搞了包产到户,并说搞包产到户好,怕就怕你们来纠偏。当时在场的还有公社的其他干部,大家议论纷纷。一位供销社的主任说:“你们怕什么?土地是集体的,公安、法院是你们掌握的,我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了,你们把我们拉回来嘛!”

我们从湄潭县到凤冈县,再到务川县,还到了毗邻贵州的四川彭水县(现属重庆市)。彭水县委的同志谨慎地介绍说,县里个别的生产队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有多少说不清。在四川省南川县(现属重庆市),看到一男一女正在田里薅麦子,我就问他们:这地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他们得知我们是从贵州来的,就放心地说:生产队的田有1/3分给个人作为口粮田,2/3是集体种的交公余粮。又说,个人种1/3的田就够吃了,只是不敢让上头晓得。

离开南川以后,我们又到道真、正安,再从绥阳返回遵义,遵义县是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站。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跑了遵义地区7个县的10多个公社,访问了几十户搞包产到户的农民。实地看

到,农村不但有搞包产到户的,而且还有搞了包干到户的,确实比集体种的庄稼好。经过这次调查,我感到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选择。

回到遵义地委,正巧碰上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李明要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谈一谈。我说,这一次调查后思想有了变化。原来说要纠正包产到户,现在看来纠也纠不了,横竖都是顶牛,再要纠偏,今年春耕生产恐怕搞不上去。纠还是不纠,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怎么搞,我说了也不算数,先听你们的意见。第一征求地委的意见,第二征求县委书记的意见,然后回去向省委汇报。省委如果同意不纠,另外再部署,如果不同意,那还得按原来的要求坚决纠正。

李明召集了地委、行署的几位负责同志,我就向他们先说了一下。多数同志表示支持。他们说,第一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也不改变;第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只要抓住这两条,也不是什么方向、路线问题。一位副专员讲,得向省委报告,不然就搞乱了。李明书记、辛墨林专员都建议我再跟县委书记讲讲,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也有好处。

这样我就跟县委书记们讲了讲个人的看法。我说,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有的搞了一年,没有搞的也在蔓延。现在到底是坚决纠正还是引导他们搞好?我倾向于认为,强行纠正不好纠正,明纠他也要暗搞,还不如公开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干脆公开,引导农民把它搞好。我们领导干部,要和农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把农业搞上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干群关系,就像猫鼠关系,我们和农民群众老是想不到一块儿去。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我们想到东,他们想到西,我们说农村形势大好,他们说小好或不好。老是这样顶牛,农业也搞不上去。现在再继续同他们顶牛,纠了以后他们还要再搞,这样大家都不踏实,还是搞不好的。多数县委书记听了以后,赞

成积极引导农民搞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愿意搞集体的也可以。

最后我说,今天跟地委讲的、跟县委书记讲的,只是通报我来调查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个人意见。省委知道我来调查,但不知道调查什么东西。省委同意还是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报告,省委研究决定以后再作传达。

一次特殊的书记会

池必卿同志说:在贵州这样的地方,我同意搞包产到户。要干就不要汇报,我们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

遵义调查历时 21 天。回到贵阳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太大,就直接去找池必卿同志。大约是 1980 年 3 月 12 日(正月二十六),我到了池必卿同志家,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下去调查的活生生的情况,正面反面的都作了汇报。池必卿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同意。又说,你讲的这个事大了,光你说了不行,今天晚上开书记会。

池必卿同志对搞不搞包产到户,尤其对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坚持农业合作化以来的那种做法,早就有他自己的想法。还在 1979 年年底,他指示省委办公厅整理了一份全省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资料,印发省委常委参阅。我给他汇报时,他说乔学珩同志提出过,可以允许农民在集体地里套种红苕,收成归个人。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晚上 8 点开书记会研究。

当晚的会,只要几位书记参加。池必卿同志是代理第一书记,苏钢同志是书记兼省长,我是书记兼副省长,参加会议的还有苗春亭、徐健生、陈行庚、吴实、李庭桂几位同志,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哪个参加哪个不参加,都是池必卿同志定的。这个书记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是在池必卿同志宿舍楼上的会议室里开的。

这个会议比较特殊,不让秘书到会作记录。池必卿同志主持,由我汇报,讲了以后就讨论。吴实说:我当红军出生入死,是要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做事的。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想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让老百姓富起来。但是搞来搞去,到现在也富不起来,连吃饭都解决不了。我们想得是很好的,但就是干不上去,方法上有问题。说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干起来就不依靠,也不相信。我看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现在去纠正也不好纠,纠了以后他们还要搞。徐健生说:搞来搞去饭都搞不了吃,我们这些人是“抵门杠”。上头不叫搞,我们跟着不叫搞,老百姓要搞,我们在中间成了“抵门杠”。他激动得站起来讲,我现在不再当“抵门杠”了,要和农民群众一起干,我们的干部也不要当“抵门杠”了。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搞上去。我们想的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还要他们干,怎么干得上去?

池必卿同志说,我支持。我知道在党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贵州这样的地方,我同意搞包产到户,具体就看怎么去搞。这个时候有位同志说,建议请示一下,中央同意以后再搞。池必卿同志说,要请示哪个批准,哪个同意你搞?要干就不要汇报,如果要汇报,我看也没有人批准你搞。我们省委干,我们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最后书记们同意池必卿同志的看法,都说不要汇报了,我们自己搞,责任自负,敢作敢当。池必卿同志说,光我们书记定了还不行,开常委会,朝文同志把他调查的情况和他的意见一起跟大家讲。

隔了一天,常委会在池必卿同志宿舍楼下的会议室召开。池必卿同志主持,先由我讲,然后讨论。在会上,书记们都支持,同意搞。常委里有的同志说,搞了包产到户,集体财产恐怕会被破坏,树子会被砍伐,带来负面影响。池必卿同志说,要搞,我们加强领导,要把工作搞好,把损失和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就行了。

这时我提了个建议说,下面正在贯彻省里强调“三不许”的那两